

蘇聯的擴張主義與世界革命戰略

尹慶耀

本文係作者向第二屆中韓學者雙邊會議所提論文，該會議已於本年（一九八一）十月廿七日—八日在漢城舉行——編者。

一

俄國過去（俄羅斯 Russia）是，現在（蘇聯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是，將來仍然是擴張主義者。其形成有其地理、歷史乃至意識形態（Ideology）的背景。

現今蘇聯橫跨歐亞二洲，面積二、二四〇萬平方公里，歐俄正面、亞俄南面，地勢平坦，缺少天然要塞，易攻難守。十三世紀蒙古人席捲過俄國大陸，十九世紀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攻陷莫斯科，二十世紀納粹（Nazi）德國進攻蘇聯，兩千萬蘇聯人喪生。這使得俄國人對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具有神經質的敏感。因此，百分之百的安全，不能令俄人滿足，其領導階層追求的是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安全保障。又俄國為大陸國家，自十五世紀末以來，即有尋找出海口之願望。「俄國要水」的口號，乃俄國傳統政策的象徵。一七〇三年大彼得（Peter the Great）在尼瓦河（Neva R.）岸建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即今之列寧格勒 Leningrad），得向波羅的海（Baltic Sea）開窗。一七八三年俄因向黑海（Black Sea）找尋出口而侵略土耳其領土，然由黑海至地中海，受扼於韃靼尼爾（Dardanelles）及博斯普魯斯（Bosporus）兩海峽，迄今蘇聯海軍由黑海前往地中海，須於八日前通告土耳其政府取得許可始得通過。十九世紀初，俄國取得海參崴（Vladivostok），可進出太平洋，然海參崴冬季仍有凍結。以是，迄今蘇聯仍在找尋可靠海港。綜上所述，不斷追尋安全邊疆及溫水港，自然形成擴張主義。

從俄國歷史看來，一四六二年伊凡三世（Ivan III）繼位莫斯科大公，其時蒙古勢力衰微，莫斯科公國國勢日強。一四七二

年伊凡三世娶東羅馬公主蘇菲亞 (Z. Sophia Palaeologa) 爲后，採用拜占庭 (Byzantine Empire) 雙頭鷹國徽，自命爲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並自稱「沙」^①。

東羅馬的東正教會 (Orthodox Church) 自第十世紀末葉即輸入俄國。在俄國，教會不能與聞俗務，沙皇却是教會的保護人。又自十六世紀開始，俄人就將莫斯科當作第三羅馬。正教會對此有一套說詞：「根據先知書，所有基督王國均已滅絕，現在就在我們君主——俄國沙皇——身上一起會合：因爲兩個羅馬已經傾覆，第三個興起，並將繼續存在，第四個將不會產生」^②。沙皇地位既已神聖化，其對外擴張亦自視爲係代表上帝完成其神聖的使命。

迨至近世，馬克思主義 (Marxism) 傳入俄國，俄國學者受影響者頗多。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成立，正式信奉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列寧 (Vladimir I. Lenin) 的布爾什維克派 (Bolshevik or Bolshevik) 建立蘇維埃 (Soviet) 政府，爲世界上第一個共黨政權。爲了依照馬克思主義圖式，繼續推展世界革命，於一九一九年成立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又稱第三國際 (The Third International)，而莫斯科又成爲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司令臺。

蘇維埃政權成立，其對內對外政策，頗多沿襲帝俄傳統或至少前後雷同處。以對內言，沙皇專制下，固然有權力的高度集中，永無止境的國家行動範圍，官僚政治，濫施淫威，秘密警察，以及對於統治人物的偶像崇拜等等現象；但馬克思視國家、政府權力爲階級壓迫工具的政治哲學，以及在由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期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在蘇聯造成與沙皇專制相同的結果。以對外交言，將大斯拉夫的彌賽亞 (Messiah) 變成馬克思的救世主義，同樣會使擴張政策神聖化，使執行者具有使命感。這種美化過的擴張主義，更難輕易放棄。

二

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寧就宣布過：「我們不僅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而且生活在許多國家組成的體系裏，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③。史達林 (Joseph V. Stalin) 說：「列寧從來也沒有把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當作自在的目的。他始終都把它當作加強西方與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環節，當作促進全世界勞動者戰勝

註① 「沙」(Czar or Tsar) 一字，源出自凱撒 (Caesar)，係東羅馬君主的俄文稱號。一九四七年伊凡四世即恐怖的伊凡 (Ivan the terrible) 正式啓用「沙皇」稱號。

註② 轉自張貴永著《俄國簡史》，(中華民國國防研究院，一九六〇年六月印行)，三頁。

註③ 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作「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列寧全集》第廿九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二二八頁。

資本的必要環節」^④。一九五九年九月黑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ëv)訪美，在大衛營抱起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的孫子說：他們這一代將埋葬資本主義。現任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hnev)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蘇聯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致詞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共產黨所負的使命是極為艱鉅的，那就是使整個世界社會都作革命性的變化，使人類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共產黨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⑤。蘇聯領導者迄今仍不諱言其世界革命的企圖，如果自由世界不予重視，責任不在共黨。

列寧的世界革命思想源自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但其革命戰略與馬、恩有異。在馬、恩的觀念裏，資產階級需要開拓世界市場，資本主義文明征服了世界，各個國家、民族的界線、特性都已湮沒，無產階級也就不分民族、國籍，彼此利害一致，因而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過，他們又認為：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⑥。因此，馬、恩的革命戰略，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依靠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佔領城市控制鄉村，佔領西方控制東方。

列寧在俄國進行階段革命，第一階段以「工農聯盟」藉民主主義革命名義奪取政權。而後進入第二階段，轉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列寧既把蘇維埃政權的成立，看作促進全世界勞動者戰勝資本的必要環節，就必須繼續推展世界革命，於是他就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並以「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盟」來達其目的。他之重視農民的力量及東方民族革命，是與馬、恩不同的。

列寧很早就注意農民問題，同樣，他也較早就注意東方的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他曾發表「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一文，贊揚亞洲到處都有強大的民主運動，希望各文明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做年輕的亞洲數億勞動者的可靠的同盟者^⑦。一九一六年列寧明白寫道：黨「主張利用一切反帝民族運動來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⑧。同年春，列寧在蘇黎世(Zürich)寫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Petrograd)前聖彼得堡，一九一四—一九二四年之名稱)印成單

註④ 史達林作「追悼列寧」，〔列寧文選〕兩卷本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中文版)，二九頁。

註⑤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第一版)，二八五頁。

註⑥ 同註⑤，二五四、二五五、二七〇、二八六頁。

註⑦ 參閱列寧作「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八二—八三頁。該文會於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刊〔真理報〕一一三號。

註⑧ 列寧作「關於白俄問題的爭論總結」，〔列寧全集〕第廿二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三三七頁。

行本。共產黨人稱此書為馬克思「資本論」的直接繼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其經由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迂迴進攻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即所謂「東方戰略」的理論基礎。但列寧絕未忽視西方國家內的階級鬭爭。

一九一八年三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列寧提出黨綱草案草稿，其國際政策是：

「首先支持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跟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進行無情的鬭爭」。

「支持一切國家特別是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民主運動和革命運動」。

「殖民地的解放。……」^⑨

把支援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擺在「首先」的地位，也許還有其他的意義。當時列寧似乎承認沒有德國的革命，蘇維埃政權就會滅亡；把蘇維埃政權從種種困難中拯救出來的，「是全歐洲的革命」^⑩。而第七次大會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決議也說：「……大會聲明，俄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將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來支持各國無產階級兄弟的革命運動」^⑪。

不過，列寧也不會忘記東方。一九一八年史達林更在「不要忘記東方」這個題目下寫道：「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他認為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不讓世界帝國主義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後方和「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就休想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休想完全戰勝帝國主義」^⑫。

三

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都是白人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成立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Comintern)，其中設有「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同年十一月廿二日列寧「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稱，帝國主義戰爭也喚醒了東方，把東方各民族捲入了國際政治生活。他強調能够獲得最終勝利的，只有全世界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俄國人創始的事業，將由英國、法國或德國的無產階級來鞏固。不過他又說，沒有各被壓迫殖民地民族勞動羣衆的援助，首先是東方各民族

註⑨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黨綱草案草稿，〔列寧全集〕第廿七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一四頁。該草稿曾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九日刊載〔共產黨人〕雜誌第五期。

註⑩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全集〕第廿七卷，八六、八二頁。

註⑪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決議」，〔列寧全集〕第廿七卷，一〇七頁。

註⑫ 史達林「不要忘記東方」一文，原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廿四日〔民族生活〕第三期社論。所引見史著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一八—一九頁。

勞動羣衆的援助，他們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單靠一支先鋒隊還不能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同時，列寧也要求與會者告訴東方各民族的被剝削勞動羣衆，他們獲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國際革命的勝利，國際無產階級是東部各民族被剝削勞動羣衆的唯一同盟者^⑭。顯然，列寧是以階級觀點看待東方民族問題的。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共產國際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和印度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羅易（Manabendra Nath Roy 1893-1954），都曾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在討論中曾發生爭論，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曾予提及。綜合列寧報告中的論點及其他有關此一問題的文章，可知他認定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本質上屬於他階段革命中的第一階段，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共產黨應該領導或參加領導此一革命，藉民族民主革命的口號，奪取政權，而後轉入第二階段的革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民族革命用以反帝國主義，民主革命用以反封建實即反政府，共產黨指當地政府爲封建政府，或指其爲資產階級的代表。共產黨又指民族資產階級有動搖性、兩面性，當工農革命發展至高潮時，民族資產階級便會與帝國主義妥協。共黨或且逕指資產階級爲替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於是民族民主革命就成爲反政府的革命，其目標在奪取政權。但在此一階段，切不可過早地提出過高的口號，不要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等口號，以免暴露了共產黨的眞面目。列寧說：「必須堅決反對把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⑮換句話說，不要把民族主義的旗幟塗上紅色，其意義在掩飾共黨的眞實企圖。

共產主義本質上具有對外擴張性質。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其任務一方面是希望其他國家的共黨政權繼續出現，作爲蘇維埃政權的屏障；從另一方面看那也是世界革命的繼續擴展。第三國際的革命，一方面面向西方，一方面面向東方，而東方也不過是迂迴進攻西方的通路。

列寧的東方戰略，爲其繼承者所忠實執行。史達林雖主張過「一國社會主義」，但他並不以在蘇聯一國實現社會主義爲滿足。而且，其「一國社會主義」的誕生，有其事非得已的現實背景。

一九二四年四月，史達林在所著「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裏寫道：「爲要獲得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底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底努力，却就不够了，——爲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共同的努力」（見「論列寧主義基礎」初稿）^⑯。那時候，史達林還是不斷革命論者，而不是一國社會主義論者。同年十二月，史達林寫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中，就已經肯定「有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

註^⑬ 列寧「在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一三七—一三九頁。

註^⑭ 列寧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列寧選集》第四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二九三頁。

註^⑮ 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曾作此自述。見《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二〇三頁。

可能」。不過他又寫道：「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的無產者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不可能，——這固然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切實，則世界革命也將愈迅速和愈澈底發展，——這同樣是正確的」^{①⑥}。

列寧生前就說過：「歐洲的革命不顧我們的願望，沒有及時爆發」^{①⑦}等等的話。到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歐洲的革命熱潮已成過去，因而史達林不得不改變策略，首先在蘇聯完成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然後以其實力支援世界革命。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史達林會把第三國際當作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使世界革命符合蘇聯的利益。

一九二二年十月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進軍羅馬，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 (Adolf Hitler) 發動德國政變。其時各國共黨日漸式微，而蘇聯本土則有腹背受敵之虞。於是，蘇聯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國際聯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蘇法協定成立。五月十六日蘇捷協定簽字。七月廿五日至八月廿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大會，通過根據季米特洛夫 (Georgii M. Dimitrov) 報告作成的「法西斯主義底進攻和共產國際爲造成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鬪爭底任務」決議和根據陶里亞蒂 (Palmiro Togliatti) 報告作的「帝國主義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底任務」決議等七項決議，要求共黨在西方以「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反抗法西斯主義 (Fascism)，在東方以「統一戰線」(United Front) 反對帝國主義。其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 (Maksim M. Litvinov) 則執行人民陣線外交。史達林原意是在西方聯合英、法、捷、波等共同抗德。俟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事件 (Munich Incident) 之後，蘇聯對西方國家漸失信心。一九三九年五月李維諾夫去職，由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 Molotov) 繼任蘇聯外長，人民陣線外交即告結束。同年八月廿三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史達林鼓勵希特勒西進。

在東方，史達林則利用中日衝突，消耗雙方實力，以減低蘇聯東方來自日本之威脅。前引第三國際七次大會根據陶里亞蒂報告作成的決議中，明白指出「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擴大民族解放鬪爭的戰線，接受凡是決意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的民族勢力，來參加民族解放鬪爭」^{①⑧}。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遵照第三國際決議，在莫斯科發表宣言，是即有名的「八一宣言」。此後，中共改變策略，以「民族統一戰線」名義參加抗戰，實係第三國際亦即史達林戰略的執行。當時，毛澤將中國社會的性質界定爲「半封建、半殖民地」，以便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符合所謂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

註①⑥ 史達林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到十月革命之路」一書的序言，「列寧主義問題」，一三二頁。

註①⑦ 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全集」第廿七卷，八八頁。

註①⑧ 陶里亞蒂當時名 (P. Teyliatti)，決議係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廿日通過，見「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底決議案」(中共，「解放社」，一九三八年六月版)。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認定「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⑨。所謂「新民主主義」，不過是有共產黨領導或參加領導，以「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為號召，性質上仍是第一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政權後還要轉入第二步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列寧階級革命論的翻版和其東方戰略的執行。

由於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蘇聯，蘇聯又與美、英等成為盟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國在歐洲已勝利在望。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S. Churchill) 與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舉行雅爾達會議 (Yalta Conference)，會中討論問題頗為廣泛。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在東歐，蘇聯要求割佔波蘭東部領土，但應允在英、美、蘇三國委員會監督下成立波蘭聯合政府；在亞洲，蘇聯要求恢復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俄國在遠東的權益（主要為中國東北的權益），作為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

聯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本應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產物，在某些情況下它被視為擴大民主基礎。但就共黨來說，那是一項政治戰略，是奪取政權的一種方式。在東歐，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首先要求內政、司法、教育宣傳以及與工農有關的部會，以便掌握宣傳、鼓動、戶政、選舉、警察與羣衆，進而奪取全部政權。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政變後，東歐各國經由聯合政府過渡到共黨政權的過程即全部完成。

在中國，首先因雅爾達密約而損失了東北的衆多權益。另一方面，蘇軍阻撓國軍登陸東北執行戰後接收任務而掩護中共軍隊前進，且以日本關東軍使用及庫存武器裝備了中共軍。同時，由美國施用壓力迫中國接納聯合政府。中國既然洞燭共黨式聯合政府之本質而不予接受。大陸乃在八年抗戰疲敝及美國撤援之下淪入竹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史達林統一戰線與聯合政府兩大戰略運用下，西方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而蘇聯贏得了勝利的成果。或者說西方贏得了戰爭，而蘇聯贏得了和平。

現今蘇聯領導人仍然襲用列寧和史達林的戰略，不過由於國勢增強且有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他們可一方面以和平共處外交掩護蘇聯及該陣營的各項建設，以繼續提高其實力；一方面支持社會變革與民族解放運動，並誘使新興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以擴展蘇聯影響力的範圍。

在共黨術語中，社會變革或進化，主要係指無產階級改變現有社會制度的革命而言。不論工人的階級鬭爭或後進地區的民族解放，都是共黨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們也都受着國際共黨外圍組織的響應與聲援。蘇聯革命成功後，即有不少赤色外圍團體出現。一九二〇年時，已有「退伍軍人聯盟」、「國際商會理事會」及「國際婦女書記處」等組織。一九二一年後，「國際商會理

註⑨ 毛澤東作「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六五八頁。

事會」改為「赤色工會」。一九二六年德籍的蒙增堡 (Willi Münzenberg) 組織「反對殖民壓迫同盟」，一九二七年又在布魯塞爾 (Brussels) 成立「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赤色工會復活，改稱「世界工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FTU)。又有「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Peace WCP)，「國際反戰戰鬥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sistance Movements) 等團體。此外學生、婦女、新聞記者、科學工作者、民主法學家、無線電與電視等等，也都有國際性組織。這些組織都是蘇聯背後支持，配合蘇聯的政策行動。又，不結盟國家會議 (Conference of Non-Aligned Nations) 之發起，原以不參加東西軍事集團，藉中立主義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為動機，惟近年來蘇聯也企圖加以利用。而利用外圍組織，對蘇聯的世界革命實極有助益。

四

蘇聯的擴張政策與世界革命戰略，不僅與其歷史背景相結合，與其他理條件也是分不開的。由於蘇聯位處歐亞大陸，在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理論方面，極容易接受麥金德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1861-1947) 的「心臟地區」(Heartland) 說。這位英國的地理學家，於一九〇四年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論文，一九一九年出版「民主理想與現實」一書。他把歐亞大陸地 (Eurasia) 和非洲稱為世界島 (World-Island)，但非洲不過是歐亞大陸的一個人口稀少的附屬品。他認為歐亞大陸或世界島的巨大內陸「心臟地區」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區域」。某一國家或集團能控制這個主要區域，就佔有了世界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二和人口的八分之七，它也就能够支配世界島。麥氏的名言是：「誰統治東歐，誰就能控制中心臟地區；誰統治心臟地區，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控制全世界」。

麥金德的地略理論過於重視陸權 (Land power)，而忽視了海權 (Sea power) 與空權 (Air power)，但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沒有獨立的空軍，其海軍也只是海岸防衛隊，它之崇拜麥金德理論自屬理所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竭力向外拓展其邊界，把東歐關入鐵幕，其意義已不止是帝俄時代把東歐當作與西方國家間的緩衝地帶，而應是利用麥氏理論來作為世界革命的重要通路了。

麥金德的理論本是為反對馬漢 (Alfred T. Mahan 1840-1914) 的海權論而發展成功的。依照馬氏的理論，誰控制海洋誰就能控制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兼為海軍大國與陸軍大國；一個國家為了獲得海權，必須具備地理位置、自然構成、國土廣袤、人口多寡、國民素質、政府性質等六項必要的條件。麥金德則倡言，人類的歷史就是海權和陸權的爭鬥史，今後世界上海權行將衰退，陸權將佔優勢^②。不過，蘇聯不僅接受了麥金德的陸權論，也向馬漢的海權論前進。

註② 參閱倉前盛通著「惡の論理——ゲオポリテイク(地政學)とは何か」(日本工業新聞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廿日第十七版)，四〇、二二頁。

蘇聯發展海軍，不過始自五十年代^②。一九六四年七月廿六日（蘇聯海軍節），蘇聯海軍參謀長希爾吉夫中將（Vice Adm. Sergeev）宣稱蘇聯海軍現在已有能力擔負重要的戰略任務，例如在世界上任何地區毀滅敵人的水面航運和攻擊海岸目標。一九六七年七月，曾任蘇聯海軍副總司令的柯托夫中將（Vice Adm. Kotov）也發表過類似的言論。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六日，蘇聯海軍總司令高爾希可夫元帥（Fleet Adm. Sergey G. Gorshkov）聲稱蘇聯不僅是一個大陸強國，也是具有約四萬公里海疆的海洋強國。他說，今天蘇聯已擁有強大的海洋艦隊，這是吸收了最新的造船、核子、火箭製造、電子技術及其他科技進步的成果所致，這支艦隊能够可靠地保障蘇聯在海洋方面的國家利益^③。蘇聯海軍已有航空母艦、數目眾多的核子潛艇及其他現代化裝備，且於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先後舉行過「Okean-70」（大洋七十）、「Okean-75」（大洋七十五）兩次大規模作戰演習。一九八一年八月又在波羅的海集結龐大海軍艦隊舉行兩棲登陸演習。蘇聯已擁有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海軍，足以向英、美的傳統海權挑戰。其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必要時亦可執行海軍輔助任務，實未可輕侮。

一九四四年美國耶魯大學地理學教授斯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出版「和平地理學」一書，首次提出「邊緣地區」（Rimland）的理論，他接受麥金德重視世界島的觀念，却否認心臟地區的地略重要性。他強調歐亞大陸西面、南面和東面的沿海地區，就是他所稱的「邊緣地區」。那包括西歐、南歐、中東、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一部分，有一片廣大的陸地，有歐亞大陸人口和天然資源的一大部分。那一個國家或集團支配了這個地區，就可以產生國際權力的優勢。因而，斯派克曼把麥金德的公式改爲：「誰控制邊緣地區，誰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的命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Cold War）開始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大致受邊緣地區理論的指導。自由與共產兩大集團之間的地略性鬭爭，也大致是在邊緣地區即歐亞大陸西、南、東三方面進行^④。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蘇聯因受西方玩「中共牌」（PRC Card）的刺激，並趁美國聲望低落及其對外政策舉棋不定時，在亞、非地區伸張勢力，並以中共指爲蘇聯手中的「絞索」的友好合作條約方式，在重要地點佈置戰略棋子。從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訪問北平並發表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將訪大陸的消息後，蘇聯先後與印度（一九七一、八、九）、伊拉克（一九七二、四、九）、索馬利亞（一九七四、七、一一，有柏柏拉港 Berbera 可用，一九七七、一一、一三廢止）、安哥拉（一九七六、一〇、八，羅安達港 Luanda），莫三鼻給（一九七二、三、三一，莫三鼻給海峽 Moza-

註②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七日《莫斯科電臺》廣播稱，蘇聯海軍已有六十三年。根據蘇中央決定，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建立海洋導彈核艦隊。然國際間一般說法，蘇聯係於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後，始大力發展海軍。

註③

蘇聯《真理報》（Pravda）（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六日）第二頁。

註④

Frank C. Darling 作「美國在越南的政策：其在動搖地區理論中的地位與國際和平」（American Policy in Vietnam: Its Role in The Quakeland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原載《亞洲觀察》（Asian Survey）一九七二年一月號。

mbique Chan. 蘇協助擴建那卡拉 Nacala 為現代化港，並在貝伊拉 Beira 港建設空軍基地)，越南（一九七八、一一、三、峴港 Ne-Nang，金蘭灣 Cam Ranh Bay，高棉的金磅遜港 Kompong Som），衣索匹亞（一九七八、一一、二〇，馬薩華港 Massawa），阿富汗（一九七八、一二、五），南葉門（一九七九、一〇、二五，亞丁港 Aden），敘利亞（一九八〇、一〇、八），剛果（一九八一、五、一三）等簽有是項條約，那些國家都在邊緣地區或非洲沿岸，而中、南非也富有能源及戰略物資，不像麥金德所說非洲不過是歐亞大陸的一個人口稀少的附屬品。上述各國括號內的港灣或基地，蘇聯均可使用。此外，北韓的羅津港 (Najen)，過去對蘇聯僅作商業性開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與北韓簽訂議定書，北韓允許蘇聯將該港作軍事基地使用^②。這對於蘇聯在邊緣地區的戰略地位，是頗為有利的。

晚近另一種地緣政治學的理论，是所謂「動搖地區」(Quakeland)，它所注意的是當弱小國家之間發生有限性衝突時，對於超強之間的權力所發生的影響。對於動搖地區，各學者有各種說法和名詞，不暇一一介紹。當前國際社會中的動搖地區有五：即西歐和東歐國家（包括西柏林）、中東、東南亞和南北韓，這些都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另一個是中美和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國家，也就是拉丁美洲地區。這些動搖地區所發生的小型政治和軍事衝突，極容易升高和擴大，而把其他大國也捲入漩渦^③。動搖地區中有些屬於第三世界，那是蘇聯藉民族民主革命旗幟或社會變革與民族解放的口號，執行列寧東方戰略的地帶。

我們要特別提出來的是亞洲東北和東南兩個半島——韓半島和中南半島，它們似乎既屬於邊緣地區又屬於動搖地區，應該是自由和共產兩大集團必爭之地。如果說美國和蘇聯之間是海權和陸權的對抗，美國除加強海上的鏈島防線 (Island-Chain-Defense I-C-D) 外，實應保持兩個半島為橋頭堡 (Bridge head)。然而，中南半島已在「低盪」(detente) 政策下失去，韓半島也必須在堅定的立場與充分的實力之下始能確保。

五

我們不知道蘇聯是否對各種地緣政治理論都同樣予以重視，但蘇聯在所謂心臟地區、邊緣地區乃至動搖地區都積極有所作為，則係事實。它對馬漢的海上權力論，也正加以利用。它四個艦隊中最小的一支——太平洋艦隊也大大予以加強。該艦隊以海參崴 (Vladivostok)，蘇維埃港 (Sovetskaya Gavan) 及堪察加半島 (Kamchatka Pen.) 上的彼得羅巴伏洛夫斯克 (Petropavlovsk) 等為主要根據地。近年來更在千島羣島 (Kuril Islands) 南端四島 (即日本所謂北方領土) 中的擇捉 (Etorofu,

註^② 漢城新聞社論委員文道彬作「美、日、中共增進軍事合作與韓半島」日文，「ASIAN REPORT」(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號)，二五頁。

註^③ 「美國在越南的政策：其在動搖地區理論中的地位與國際和平」。

Iturup)·國後(Kunashiri)·色丹(Shikotan)等三島上加強軍事設施，俾使鄂霍茨克海(Okhotsk Sea)變成爲蘇聯的內湖。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的海參崴，每年約有五個月的冰凍期。但羅津港則爲不凍港。現羅津港與海參崴之間，已有柏油路可資連絡，必要時前者可爲海參崴之代用港。在中南半島，蘇聯取得由美國建設的金蘭灣使用權後，太平洋艦隊的機動能力更大爲增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資源開發逐漸東移，它原有的西伯利亞鐵路(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TSR)係於一九〇四年完成。現爲應開發需要，已有南部、中部、北部西伯利亞新鐵路的規劃。現正修築的貝阿鐵路(Baykal-Amur Railway; B.A.M.)，由貝加爾湖至阿穆爾河(黑龍江)，乃北部西伯利亞鐵路東段的幹線，自一九七四年動工，現已有三分之一建成通車，預計到一九八五年可全線通車^②。該路建成後，對該地區之交通運輸大有裨益，對資源開發及太平洋艦隊之補給將有極大貢獻。

據日本防衛廳透露，現蘇聯遠東聯合指揮部轄下有三九師部隊，五師在外蒙，二一師在西伯利亞濱海省，八師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線，一師在堪察加，三師在庫頁島(Sakhain Is.)，一師在日本北方領土。而中蘇邊界的一二師不在此內^②。由此可見，蘇聯在遠東的兵力部署，係從其全球戰略(Global Strategies)着眼，也就是要擊敗以海權爲主的美國並打擊日本。儘管中蘇兩個共黨政權有衝突，但它們不僅在意識形態(Ideology)方面有其共同點，而且雙方都沒有真正彼此拼鬥的意願。蘇聯在中蘇邊界的兵力不多，它最上策是迫使中共重回蘇聯集團，目前不少蘇聯專家的論調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半中共將有所轉變。中共一向指蘇聯「聲東擊西」，美蘇爭奪的重點在歐洲，目前拉攏華盛頓，用意仍在使美蘇對立，而中共本身已不再指責蘇聯爲「修正主義」，聲言自己對蘇聯不構成威脅^②，以安撫對方。中共擬藉西方力量充實自己，以此爲資本在比較平等的條件下與蘇聯緩和緊張，它們間的關係不會是一成不變、永遠對立的。

蘇聯四大艦隊中，除其北海艦隊重在防衛外，其波羅的海艦隊可自北大西洋南下，沿非洲西岸繞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再沿非洲東岸北上；其太平洋艦隊可自海參崴出發，經韓、日、臺、菲海域，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與波羅的海艦隊在印度洋會合，構成大的戰略弧形。又蘇聯黑海艦隊可經韃靼尼爾海峽入地中海，取道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

註^② 入莫斯科電臺(一九八一年八月廿六日)廣播。按該鐵路原定一九八三年建成，似有延誤。

註^③ 一、入法新社(東京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七日)第一版；二、入中央社(東京同月七日)電，臺北，「臺灣新生報」(同月八日)第四版。

註^④ 參閱蔣元椿作「論蘇聯的東亞戰略」，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第七版。又蘇聯「消息報」(Izvestiya)政治評論員波文(Aleksandr Bovin)、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古杜希尼科夫博士(Dr. L. M. Gudoshnikov)等均認爲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中(共)蘇關係可能正常化。

，出紅海入印度洋，與太平洋艦隊會合，構成小的戰略弧形。正如中共所說，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軍事冒險，使巴基斯坦和伊朗處於「下一個輪到」的地位。蘇聯一旦在印度洋有了港口基地，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海灣石油和其他戰略資源，控制了世界三大戰略航道——從海灣通向蘇彝士運河、麻六甲海峽和好望角的航道。這三個航道像三根大動脈把這裏的石油運往美國、西歐、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世界各地²⁹。

目前，蘇聯海軍已有能力進行新型「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又蘇聯曾於一九七五年用飛機、輪船運送古巴軍隊至安哥拉；一九七七年以大空運補給軍援物資至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eba)、亞丁、莫三鼻給的馬普托(Mobote)及其他地點；一九七九年八月運送軍隊和補給品到南葉門和衣索匹亞；十二月侵略阿富汗，其安托諾夫112型(Antonov-22)及伊留申七六型(Ilyushin-76)等飛機發揮了高度的效率。這些證明蘇聯已具備充分的空運能力，也是向外擴張的有力工具。

六

十九世紀帝俄擊退拿破崙，二十世紀蘇聯擊退希特勒，乃是焦土政策與戰略撤退的結果，這使得俄國人以空間換取時間及數量優勢的觀念不容淡忘。惟在核子時代，蘇聯似已將空間觀念推廣應用於世界革命，即在國際間擴大社會主義的勢力範圍與影響力。至於數量觀念仍然牢固，蘇聯傳統兵力與武器裝備，在質量雙方均有領先世界之勢，核武器在數量上也超過美國。其所以如此，一則從蘇聯若干軍事文獻上可以發現，其軍事思想仍然認為在核子打擊之後，武裝部隊還有執行戰鬥任務的必要。因為他們深信必須經過一連串的陸戰、海戰和空戰，才能徹底毀滅敵方武裝力量而確保最後的勝利³⁰。正因如此，蘇聯才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起，大量增加國防開支，同時發展各式武器。二則在蘇聯的觀念裏，(對美國)七比一、八比一的優勢未必可靠，只有一五比一的優勢才可以安心³¹。因此，數量(當然也不忽視質量)優勢，恐仍為蘇聯未來追求的目標。此外，俄國人還有一種權力相對性(Relativity of Power)的意識，那是說假使對方減弱了，也就等於我方增強了³²。其實，共黨特別重視國際間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使用革命或外交手段，分化對方陣營，爭取或促使其一部份中立，就形成敵消我長。這種想法源自「量變質」(

註²⁹ 中共《新華社》評論員文章「戰略重點依舊，情況有所變化」(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播發)。

註³⁰ A. Cabrera Marias 作「作為蘇聯地略目標的大西洋」(The Atlantic As An Objective of Soviet Geostategy)，原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雜誌》(Nato's Fifteen Nations) 一九七〇年五月號。

註³¹ 美國國防情報局(DIA)前局長威爾遜(Samuel Wilson)將軍語，見「蘇聯外交動態——美國衆院外交委員會報告書」，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夕刊第一面譯文。

註³² 參閱前美駐蘇大使柯勒(Foy D. Kohler)作「共產黨的目的——支配整個世界」(The Communist Objective-Domina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Society)，原載美國《兵工雜誌》(Ordnance) 一九七二年一月號。

Transition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的「辯證唯物論」(Dialectic Materialism)。列寧的東方戰略，特別重視中國與印度，也與掌握人口的數量優勢，以便促成質變的意識有關。

蘇聯的擴張主義與世界革命戰略，已將俄國的歷史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世界的地略學說與共黨國際主義的階級鬭爭乃至軍事與政治等等融為一體。不過，當列寧分析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時，他強調的是：「戰爭是全體中的一部分，而這個全體就是政策……政策是主體，而戰爭則僅為工具，二者決不可本末倒置。所以，軍事觀點必須使其臣屬於政治觀點之下……戰爭為政策使用其他手段(即強迫手段)之延續」^⑧。克勞塞維茨認為軍事權力的使用是爲了達到政治目標，而列寧則認爲政治是戰爭的延續。列寧及其繼承者，把戰爭溶合在政治和階級鬭爭之內，除軍事外，諸如思想、外交、經濟、科學、顛覆等等，無一不是鬭爭工具。戰爭與和平已不再是「二元論」，而是辯證統一。

因此，儘管蘇聯在大力發展武力，我們還不能說它準備立即發動一場全面核戰。它的核武器以及其他傳統武器，正在發揮嚇阻、補給、炫耀、示威、心戰等等效果，它正巧妙地使用軍事力量作爲政治工具。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蘇聯首先以武力嚇阻對方發動大戰，其次除在其本身邊界(包括東歐)安全受到威脅(那也許只是一種神經質的想像)將直接使用其武力外，在其他地區它仍將以煽動革命的方式，藉「代理戰爭」獲致局部性勝利，誘使新興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以伸張其勢力；再次則在世界戰略要點佈置棋子並求遮斷海上的交通尤其是運油航線。但是，我們必須強調指出，一旦蘇聯在本身武力及所謂國際階級力量對比與戰略形勢佔有壓倒性優勢時，它可能由量變到達質變階段，向自由世界發動決定性的最後一擊，那是絕對不可加以忽視的。當然最上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以上我們僅從理論和蘇聯的意願方面分析了它的擴張主義與世界革命戰略，事實上蘇聯本身仍有不少嚴重的弱點在。首先，誠如馬漢氏所云，任何國家都不能兼爲海軍大國與陸軍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的挫敗，即可爲馬氏理論的佐證。現今蘇聯在「心臟地區」「邊緣地區」「動搖地區」乃至海洋，幾乎到處伸手，那只會激起抵抗，增多其本身覆亡的機會。其次，蘇聯的軍事費用已佔其國民總生產(GNP)的百分之二一——一四，嚴重地壓迫其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繼續爭取數量優勢，其財力終將不勝負荷；復次，第二次大戰後蘇聯將東歐關進鐵幕，初期可藉剝削該等國家促成蘇聯經濟的迅速成長，然此後該等國家將由蘇聯的資產變成負債，目前的波蘭危機，蘇聯即深感束手。至於其他共黨政權，如蘇聯每天援助古巴八〇〇萬美元，援助越南六〇〇萬美元，仍無助其解決貧困，此等負擔將愈來愈重。最後，今日世界已非往昔，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不合時宜，前此之殖民地幾已全部獨立，蘇聯雖可利用新興國家的反西方情緒繼續執行其東方戰略，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個成功的好榜樣，受其影響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三世界國家無一不失敗，今後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將逐漸減少其影響力(自由世界實不應放棄意識

註⑧ Karl Capf. Paul R. Schratz 作「南海之紅星」(Red Star Over The Southern Sea)。原載美國《海軍月刊》，一九七〇年六月號。

形態的鬭爭)，而蘇聯的擴張主義面貌終難長期掩飾。第三世界的覺悟，將與東方戰略的效用成反比例的發展。

蘇聯的擴張主義與世界革命戰略，是其歷史傳統與共產主義思想意識的產物，它不會由於自由世界的善意、中立或退縮而稍加收斂，那可能反而助長它的野心。充分發揮自由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力量，遏止蘇聯的野心，使其不敢存非分之想，可使人類避免另一次浩劫。把話轉回東亞來，儘管蘇聯正加強其軍事基地的建設並增高其太平洋艦隊的戰力，但這支艦隊南下，與越南的金蘭灣取得聯絡，仍將受扼於日本的宗谷 (Soya)、津輕 (Tsugaru)、對馬 (Tushima) 三海峽，大韓海峽 (Korea Strait) 及臺灣海峽 (Taiwani Strait)。只要這些自由國家堅定、堅強與合作，蘇聯的擴張是可以遏阻的。

五次圍剿戰史 (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郵資另加 國外：平寄 美金 八元
航空 美金 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